

改变朱德一生的上海之行

1922年6月,朱德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名誉、金钱和地位,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江轮,沿着奔腾的长江顺流而下,到上海去寻找革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跳出了原先局限于四川、云南、贵州的小圈子,跨进了一个新世界。这次行程是朱德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他一生道路中一个伟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从此他开始了革命的新生。



从黑暗中走出来

朱德早年就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在积极参加同盟会秘密革命的同时,他认为自己“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蔡锷部下当排长,他经常深入到士兵群众中去,进行革命的宣传,在士兵中广泛地撒播革命的种子。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给了朱德很大影响。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向中国文化中一切封建的东西宣战。他在北京的好友孙炳文热情地写信介绍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热情地介绍这股新思潮,使他大开眼界。

拯救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朱德与好友们经常讨论。为什么中国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而俄国的革命却取得了成功?朱德认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他俩商定,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回师云南,等打倒军阀唐继尧后,再到北京与孙会合。

1922年初,被赶出云南的唐继尧又卷土重来,空虚的昆明被占领。朱德只能撤离昆明,北上向四川进发。

在四川,朱德听到中国共产党已成立的消息,异常兴奋。他认识到中国革命之所以一次次遭受失败,说到底,就是缺乏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必须要有一个像领导俄国革命的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中国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正当他准备顺江而下,去上海寻找中国革命的引路人时,滇军老同事、军阀杨森打来电报,热情地邀请他去重庆作客。朱德清楚地知道,四川军阀的暗探很多,如果拒绝邀请,自己和全家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6月初,朱德来到重庆。

杨森前往码头亲热地迎接朱德,并一再邀请朱德留下来当自己的师长。他认为朱德年已36岁,既无家产又无前途,肯定能留

下来为自己服务。没想到苦苦纠缠了一周,朱德还是婉言谢绝了。朱说明自己正想去外国留学,去寻找新的生活。杨见他不为所动,就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为他保留个位子,等待着他的归来。于是,朱德离开重庆,一周之后,来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

在启程赴欧之前

重庆到上海的途中,朱德经过反复考虑,计划要做3件事:1. 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去治疗烟瘾;2. 考察沿海地区和北方的城市;3. 希望孙炳文能为自己介绍国共两党领导人孙中山和陈独秀。船到上海,朱德上岸后就住进法国圣公医院。

住院期间,朋友们送来了各种书刊报纸,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消息和中共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报道,深深地吸引了朱德。特别是《民国日报》上刊登的消息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引起了朱德的强烈共鸣。

朱德从报纸上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上组织了新的工人运动。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1921年9月起,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三次向资方要求增加工资并提出工会有权介绍工人就业的要求都遭拒绝。1922年1月12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宣布罢工。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全国工人阶级支援这场罢工,工人运动在全国迅猛发展。在全国工人阶级的支持下,香港海员坚持斗争,历时8周,终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1922年3月8日,广州10多万群众集会欢庆胜利。朱德认为这场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打响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工人阶级。

5月1日,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保障劳动利益”和“组织工会”等决议,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8小时工作制,

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权,禁止虐待工人。

朱德出院后,决定对上海进行仔细的考察,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走遍了整个上海。无论是有着高大的楼房、宽敞平坦的马路和先进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外国商业区与住宅区,还是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和设备简陋的小工厂,都留下了朱德的足迹。他看到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工人阶级,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夜里睡在冰硬的便道上和高楼的阴影里,而这些高楼是他们亲手建造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他认为上海是“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的天堂,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他确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他看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可悲景况。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不仅未能担负起使中国富强的责任,反而使成千上万的同胞在机器的奴役下迅速沦为极端贫困的无产者。民族工业如同一个先天不足的畸形儿,上海成了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给了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这使朱德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的希望,他寻找党、参加党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由于当时党处在创建阶段,处于秘密状态,而且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6月,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启汉,租界会审公判了他3个月徒刑,期满后永久逐出租界,并查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7月,租界当局又查封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所以,朱德未能如愿以偿找到党。

7月,朱德来到北京,住在孙炳文家中。孙陪他观光全城,介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大学生。可惜陈独秀不在北京,无缘见面。孙又陪他经宣化、张家口到内蒙考察、参观,特地去了鸡鸣山煤矿,下了矿井,深入了解中国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

朱德在孙炳文的陪同下又回到上海。8月14日,因陈炯明叛变而逃出广东的孙中山抵达上海。朱德和孙炳文闻讯后,与金汉鼎一起到孙中山在法租界香山路寓所拜访了他。正处在危难之中的孙中山,见到护国军名将朱德,觉得人才难得,马上要求朱德重回滇军,进行整编,自己可预付10万元,以期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政权。

朱德和孙炳文非常尊敬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们婉言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并耐心地说明:已对孙中山和国民党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失

去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中国革命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朱德和孙炳文还告诉孙中山,自己已决定到欧洲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

孙中山问他们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留学?朱德回答:因为没有可供在美国读书、久住的钱,而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所以到欧洲去留学。朱德还提醒孙中山:虽然孙一直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从来不加援助,只帮助和承认孙中山的敌人。只有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孙中山表示同意朱德的意见,并说明正在制订国民党的新的政策。

在闸北区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朱德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朱德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

陈独秀打量着朱德这个当时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军官,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陈独秀没有立即答应他的入党要求,使他感到绝望。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但他没有放弃追求真理的信念及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1922年9月,朱德和孙炳文在上海乘上了法轮“安吉尔斯”号前往法国。到法国后,他们听说中国留学生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而主要组织者周恩来已到德国去组织新的支部了。1922年10月22日,朱德与孙炳文赶到德国柏林,找到了周恩来,同他作了彻夜长谈,详细叙述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向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年底,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朱德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

王尚

来源:云南党史网